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心理学（第二辑）

儿童人格之培养

〔美〕迈尔士 (G.C.Myers) 著 谭文山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心理学（第二辑）

儿童人格之培养

〔美〕迈尔士（G.C.Myers）著 谭文山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人格之培养/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心理学)

ISBN 978-7-5520-1828-8

I. ①儿… II. ①李… III. ①儿童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094号

儿童人格之培养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7.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28-8/B.203

定价: 90.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3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6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美〕邁爾士（G.C.Myers）著 譚文山 譯

兒童人格之培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原序

世上有沒有人爲教養兒童而不到處探求關於改進兒童人格的方法呢？請細聽那討論日常問題的父母和教師底談話，馬上便可看出他們總是被兒童個人的種種特性所煩惱。智能的訓練和人格的訓練比較起來，乃居於次要的地位。凡參加過父母和教師會議的人，沒有不聽見他們討論到消除兒童人格上要不得的特性，而培養其可愛的特性的。對於討論這種問題，無論貢獻任何意見，都必受一般在家庭裏、學校中、或社會上從事兒童教育的人們熱烈的歡迎。所以我敢斷言，邁爾士教授這本書將爲一般父母、教師、監護人和社會工作者熱烈地傳誦。

讀者只要把本書打開，向前讀去，他底人格的觀念，便會擴大起來，因本書著者對於人格問題，比一般人及大多數的教師和父母，還格外了解，並格外看得重要些。邁爾士教授把兒童底各種特性，都包括在人格裏面，除了嚴格的智能過程之外，一個人對待別人的種種態度，對自己的情感對所處情境的反應，所說所做的事情，所觀察的方法，所有的姿態，以及不知不覺的習氣——這些都是他人格的要素，而爲討論如何改進人格時所必須注意的。實際上一切影響兒童的東西，同時也能有益或有害於他底人格。他往往對於別人在他跟前所說的話，或所做的事，顯明地發生感應或

內心發生感應，雖然那些話或那些事並不是特別爲他而發的。又他往往從他身邊的人們——同伴、家中來客、哥哥、姐姐，尤其是父母、教師和監護人——底聲調、外貌、主張、行動，可以得到他的暗示。據邁爾士教授底意見，兒童或青年在社會情境中，決不會取中性的態度的，他們常常受社會環境的一方面或他方面的影響。因此，凡訓練兒童的人們底言行，或對訓練兒童只取旁觀態度的人們底言行，在訓練的時候，於形成兒童底人格，都有重大的影響。

我們大多數人，推進兒童教育，都抱有偏見，似乎只將自己顯然爲影響兒童而從事的工作，才認爲對於他們底發展是重要的。邁爾士教授在本書中，對於此點，卻獨具卓見，與別人不同。他極力想使一般培養兒童人格的人們知道，兒童雖然常對他所發生的事情，不負責任，但事實上，他卻用各種方法去反應，當他反應的次數漸多，便愈現勇敢，或愈現膽怯，愈現恭敬，或愈現無禮，愈知道感激別人爲他增進幸福的努力，或愈對別人底好意表示冷淡的態度……等。父母、教師，以及監護人，往往對於兒童內心反應的表露漠不關心，殊不知這種反應正是造成兒童對待和他接觸的人們所採取的態度。邁爾士教授在本書的字裏行間，時時教我們這般和兒童接觸的人們，知道我們一言一動，都必須小心，甚至聲調、姿態和面部表情，都要謹慎。他底目的，並不是要給那般以嚴厲態度教養兒童的人們當頭一棒，不過是要使教養兒童的人們注意兒童對於周圍發生的事情（甚至與他們幸福只有微少關係的事情）所生的感覺。

讀者披閱本書，必會深受感動，而且會發現邁爾士教授所論兒童安適之感的重要——這一

點，是大半爲我們教養兒女的人們所不注意的，因爲我們常常以爲兒童不會很靈敏地發覺那些傷害他們個性的事情。一個典型的父親，甚至一個典型的教師，一點也不知道兒童對於社交的安適——在與他有關係的人們當中，感到安適——的敏感性。如果一個讀到這裏的讀者，到街上去問他所遇到的行人，即兒童或青年對於他們在團體中的社交地位是否很關心或很煩惱，恐怕一百個行人當中，便有九十五個用漫不經心的口吻答道：「唔，自然他們不關心。」無論是誰，仔細讀了本書所論兒童安適的幾章之後，也許會改變他對兒童在社交情境中的安適之感所持的見解。兒童極易感覺任何人把他當作團體中一分子看待因而給予他的批評或尊重。因此，邁爾士教授向父母、教師與監護人再三地請求他們小心點，不要傷害兒童在社交情境中的安適之感，並鼓勵他們培養兒童社交的勇氣，以使其人格不致受自卑的恐懼或任何社交的恐懼所傷害。生理的缺憾，也許對兒童人格是有傷害的，不過不如社交的恐懼來得厲害。妥當地說一句，邁爾士教授此種見解，對於大多數負有教養兒童和青年責任的人們，可以說完全是一種創聞。

本書作者，一方面身任教授，在大學裏教導一般做了父母的大學生，一方面又在社會上指導一般做父母的人們。他許多年來，筆頭非常活躍，常寫一些文章，討論成人應如何對待兒童，以及訓練兒童人格、品性、生理和心理的發展所用各種方法的效果。這些年來，一般父母、教師和監護人，都供給他們許多具體的問題作參考。他又對那般教養兒童而發生疑難的成人，無論在家中、學校裏、或別的地方，都樂於給他們指導。他認爲指導他們必須用簡單樸實，或平易淺顯的名詞，才能使他

們容易了解，故本書的筆調，確實是從當時在辦公室內，別人向他請教時，所記下的說話資料——文句不拘形式，不求外觀漂亮，而能比喻豐富，有時且生動如繪，並常常是很有力的。如果他打算把此書寫成給心理學者批評，那他底造句解釋和語彙，一定與本書現在所用的，完全不同。當他準備寫此書時，他心中始終存着一種觀念——以為使教養子女而遇到具體問題的人們了解兒童和青年底幾種基本特性及需要，並激動他們去解決這些具體問題，乃是他底職責。假若一個博學的心理學者或一個兒童教師，讀了這本書，他應當時時記着：它是為誰而寫的，然後他才了解作者是應該對於某些事情，不惜筆墨，反覆解釋，尤其是向一般教養子女的人們警告，要他們不可用粗暴的態度對待聰明的兒童，不可傷害兒童，尤其不可驚嚇兒童或引起兒童在任何情境之中發生自卑之感。

俄希亞 (M. V. O'Shea) 序於威斯康辛大學

譯者序

本書著者邁爾士教授，是美國著名的兒童教育學家。他本許多年的教學經驗，寫成兩部可愛的書籍：一是現代父母（The Modern Parent）——商務印書館有章衣萍秦仲實兩先生底譯本，名怎樣做父母——，一是兒童人格之培養，它們堪稱姊妹篇。後者雖說是一本教育理論的著述，但它並不像通常一般教育理論書籍的抽象、空泛和枯索，因為著者深知討論兒童教育，不是一件紙上談兵的事情，而且為的使一般讀者易於了解起見，故他每當討論一件事情或研究一個問題的時候，總要用平易簡潔的文筆，寫出一些生動有趣的實際經驗來作例證，使讀者看了只覺津津有味，而毫無枯索之感。至於講到本書底特點，俄希亞（O'Shea）教授在他底序文中已經說得很明白，讀者可以參看。

譯者譯述此書，是用的直譯法，就自己力量所及，務求忠於原文，將作者本意顯達出來；不過偶爾遇到原文中有些言外之意的地方，則間或採取意譯，總之以不失原書精義為主。

我要感謝陸師步青，因為他介紹這書給我翻譯，並細心地為我匡正譯文。又徐升庸兄替我校訂原稿和蔣石洲兄給我許多指示，亦一併在此誌謝。

譚文山

第一章 人格與生理的因素

假若其它一切的條件均等，那麼一個生理和心理健全的兒童便具有較好的人格，依照白宮會議（White House Conference）研究的結果，每十個兒童當中，祇有七個是常態的，其餘三個都有某種生理上的缺陷。

雖然我們不知道一般聾了耳朵或瞎了眼睛的兒童在精神上所感受的痛苦，但我們總承認他們人格上是有了解礙。不過對於那般視覺和聽覺只有一點毛病的兒童，我們卻往往容易把他們忽視了。

近視眼的兒童

近視眼的兒童常是膽怯的，他們不願參加團體活動，他們喜歡和人爭論。平常在遊戲場中格鬥，他們總是要吃虧的。他們底對手攻打他們，不等到他們反攻，便已跑走了。所以他們很容易受強暴兒童底欺凌。他們因為吃了虧，空發脾氣，便容易做出種種幼稚的行爲；又因為恐懼，還會自己暴躁起來。在團體比賽或技巧的遊戲中，他們受了生理上重大的障礙，不能與其他兒童盡量地競爭。